

体育报道中争议性事件修辞策略研究

郭 晴¹, 杨 茜²

(1. 浙大城市学院, 浙江杭州 310015; 2. 武汉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湖北武汉 430058)

摘 要: 该研究将框架研究与修辞路径研究相结合, 运用中美孙杨兴奋剂仲裁案报道为例, 探讨了争议性事件报道中的修辞策略, 以提升中国对外宣传机构在争议性事件报道中的话语能力。研究发现, 中国媒体具备建构新框架的能力, 美国媒体对框架的整合发挥了辩论效用; 在争议性事件报道中, 定义和公共价值是修辞路径的核心; 中美媒体均忽视了差异与共同责任, 对话性不足。该研究为中国媒体在争议性事件报道中提升话语能力提出如下建议: 应注重框架的调用、创新和组织; 谨慎定义、追求公共之善; 正视差异, 以对话实现争议性事件报道的“求同存异”。

关键词: 体育报道; 争议性事件; 报道框架; 公共价值; 修辞策略

中图分类号: H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418 (2022) 03-0073-10

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的国际动荡变革期, 国际话语权已然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焦点。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 我国已从根本上扭转了过去落后、贫穷的局面, 但在国际社会“挨骂”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国际话语权建构过程中, 在争议性事件中积极发声、引导舆论、回应质疑是解决“挨骂”问题的关键。争议性事件是指因利益、道德情感、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多元不同意见, 引起各方讨论与争论的社会事件。^[1] 当前, 中美关系震荡, 中美媒体也在诸如中美贸易摩擦、南海问题、新冠疫情、体育等争议性事件报道开展竞争, 争夺话语权。体育领域是争议性事件的高发区, 从中国进入国际赛场以来, 与兴奋剂、判罚不公相关的事件一直都是中外争议的焦点, 而媒体通常在其中担任了辩论者的角色。从伦敦奥运会上西方媒体对叶诗文成绩的质疑, 到平昌冬奥会中国短道速滑面临的判罚争议,^[2] 中国面临有理说不出的困境, 长此以往极大影响了中国体育的国际形象。修辞学被看作是一种意见塑造技艺,^[3] 修辞对于体育争议性事件报道中的意见表达、争取有利国际舆论及促进国际对话起到重要作用。

孙杨兴奋剂仲裁 (下面简称孙杨事件) 历经两年, 是中外媒体关注时间最长、关注度最高, 且引起了激烈辩论的体育争议性事件。2020 年 2 月,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 (CAS) 宣布孙杨因违反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WADA) 检测规定, 破坏取样瓶被处以禁赛 8 年。2020 年 12 月 24 日, 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宣布由于 CAS 仲裁小组成员发表过歧视中国人的言论, 撤销此前裁决, 发回重审。2021 年 6 月, CAS 宣布, 孙杨的 8 年禁赛减为 4 年 3 个月, 孙杨针对 CAS 的决定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2022 年 3 月 4 日, 瑞士联邦最高法院驳回了孙杨的上诉, 维持后者此前对孙杨做出的禁赛至 2024 年 5 月底的处罚, 至此孙杨事件尘埃落定。

孙杨事件引发了国内外的广泛讨论。在该事件中, 孙杨坚称未服用兴奋剂, 但因砸碎了检测瓶, 他不能证明自己没有使用兴奋剂, 而禁赛裁决主要依据为孙杨违反检测程序, 也就是 WADA 不能证明孙杨使用了兴奋剂。孙杨和 WADA 实际上都未揭示是否服用兴奋剂这一焦点, 正是这种不确定性给予媒

体就其中争议点进行辩论的空间。综上，本文以中美媒体对孙杨事件报道为例，试图发现中美媒体在争议性事件中使用的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争议性事件报道的修辞路径，提出我国媒体应对争议、争取良好国际舆论并推进国际对话和社会进步的与建议与启示。

一、文献综述

（一）兴奋剂事件的报道框架

框架的概念最早出于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架构分析》，从建构主义的角度出发，戈夫曼强调框架是社会行动者理解社会场景、诠释意义的工具。^[4] 威廉·甘姆森（William Gamson）将框架（frame）定义为“有组织的中心观点或者故事线索，为一系列的事件提供意义”^[5]，框架很大程度上作为信息接收者审视世界的“窗口”，新闻如何选择、强调、排除、架构一起事件，成为社会行动者理解外部事件的核心原则和逻辑。^{[4] (65)} 由此可知，报道框架为受众提供可辨识的意义。还有研究显示“框架化”过程，即对特定议题呈现方式的操作很可能会引起舆论态度的大改变。^[6] 有鉴于此，框架有着建构认知和引导舆论的功能。

针对作为典型争议性事件的兴奋剂纷争，有研究指出在报道美国短跑运动员琼斯兴奋剂事件时，媒体主要使用了道德话语，将其描述为颜面大失的丑闻及具有传染性的个体失败。^[7] 还有学者在比较挪威和瑞典媒体对挪威越野滑雪运动员特蕾丝·约蒙格（Therese Johaug）兴奋剂检测阳性的报道后，发现挪威媒体不愿将她称为服用兴奋剂者，而是将她塑造为受害者，但瑞典媒体则非常严厉地批评了挪威滥用药物现象。^[8] 据此，兴奋剂事件的报道还可能包含国家之间孰优孰劣、谁是谁非的比较，也就是一种民族主义框架。对于新闻媒体而言，在报道中调用历史先例、构建历史类比（historical analogy）既是新闻生产常规，也是重要的媒介记忆类型，而媒介构建的集体记忆具有导向功能^[9]。基于此，历史框架在兴奋剂事件报道中也较为常见，如有学者发现西方媒体在质疑叶诗文伦敦奥运会的成绩时，将她和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的兴奋剂事件联系起来。^[10] 另外，由于兴奋剂事件往往较为复杂，报道中有大量对兴奋剂检测、法规、机构等知识的介绍，笔者认为这是兴奋剂事件的知识框架。

由上述梳理可知，兴奋剂事件报道常使用道德、民族主义、历史和知识框架，本文还将考察中美媒体是否使用了其他框架。

（二）新闻报道中的修辞路径

学者刘涛指出，当不同话语尝试对某一议题给出不同的诠释体系时，争议便产生了。只有进入具体的争议实践中，才能发现不同话语的逻辑体系，从而揭开话语深层的框架面纱。同时，他还认为，框架存在一个普遍而深刻的“争议之维”或“争议之所”，应从争议中发现和识别框架。在具体的话语实践中，框架的“作用方式”就是尝试对争议进行宣认。古希腊修辞学家赫尔玛格拉斯（Hermagoras）以法律修辞为例，将“事实”（fact）、“定义”（definition）、“品质”（quality）和“程序”（procedure）确定为修辞情景中的四大核心争议点。^[11] 但笔者认为，仅讨论争议宣认可能导致忽略了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提出的修辞中的重要资源——情境、道理、情感、人格权威等因素。此外，另有学者也指出，上述四大核心争议点是基于古典法律修辞传统，根据新闻报道的实际提出包含修辞情境、争议宣认和修辞资源的修辞维度架构（具体见表 1）。^[12] 故本研究将修辞情境、争议宣认和修辞资源结合，分析中美媒体对孙杨事件的报道。

表 1 修辞维度架构

争议点	争议点构成	争议点构成释义
修辞情境	紧急状态	一件不完美或是偏离正常的、但能通过话语改变的事
争议宣认	听众	主要是指在决定和行动上受限制的听众
	事实	围绕事件所牵涉的事实，是修辞者肯定且能在证据上做出认定的存在
	定义	围绕事件的本质属性，为事件添加有利于己方修辞目的的前缀，包括程度、性质等形容
	品质	强调对可能影响人们观点和判断的其他相关因素进行推测
	程序	标准是否适用、程序是否合法
	价值	旨在建立或强调一种新的共同价值认同，包括伦理价值、文化价值、公共价值和权利价值，其表现为具有统摄作用的且反复出现的观念
修辞资源	道理	客观规律、既已发生的事实
	情感	受众的情绪调动
	人格权威	发言者或者书写者的可信度

笔者认为，报道中的修辞情境是由生产者构建出的紧急状态，听众也就是受众，是隐匿的大众，听众的特质对修辞应用的影响将归于品质要素中。本案例中事实主要基于公开、规范的仲裁，故本文在争议宣认中不对程序进行分析。结合本研究实际，本研究的修辞维度为：修辞情境，包括紧急状态；争议宣认，包括事实、品质、定义、价值；修辞资源，包括道理、情感和人格权威。

（三）争议性事件中的对话

由于争议是参与者之间的举动和对抗建构的交流性行为，因此解决争议必须回归交流，也就是通过对话消解争议。^[13] 根据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话是由向心话语与离心话语在辩证的、相互矛盾的交互过程中构成，意义来源于这一过程。^[14] 此次对孙杨仲裁案的报道也可看作为中国的一次对国际传播实践，其中包含了中美双方不同观点、不同诉求。有学者指出，为提升国际传播效果就必须正视文化差异。^[15] 因此，对话理论对于争议性事件的国际传播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国际传播主体之间是一种“我”与“你”的平等关系，双方在尊重个性、承认差异、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开展平等对话，最终相互理解并达成共识。^[16] 也就是说，对话有助于调节国际传播中的“异”与“同”。其中，除了国际媒体运用事实和秉持观点的不同，“异”还包括文化、认知上的差异。胡百精指出，共同体精神和公共之善可以让我们从无可避免的利益纠缠中走出来，并达成共识。^[17] 据此，笔者认为，“同”是在尊重双方差异基础之上可实现的公共之善。

综上，框架是具体修辞辩论的单位，框架中包含着一定的修辞维度，各修辞维度的组合形成了修辞路径以进行辩论，而对话有利于消解争议、达成共识。由此，本文将解答以下问题：（1）中美媒体在孙杨仲裁事件报道中使用的框架；（2）框架中的修辞路径；（3）中美媒体的对话性。

二、数据来源

在媒体选择上，本文选取了国内主流媒体新华社英文版、*China Daily*、环球时报英文版、CGTN 英文版和人民日报的英文报道。在美国媒体方面，本文选择了关注国际事务的有线电视新闻媒体 CNN、专业体育媒体 ESPN、以用词极端、选择性报道著称的右翼媒体 FOX NEWS、“中间偏左”的传统大报

——《纽约时报》和作为通讯社的美联社（具体数据见表 2）。我国主流媒体的英文报道目标受众为以英语为母语或具备英语新闻阅读能力的外国公众，美国媒体主要受众则为美国本土公众和其他具有英语新闻阅读能力的各国公众。表 2 显示，中国对外媒体特别关注孙杨事件，一共有 34 篇报道，美国媒体有 12 篇，中国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量几乎是美国媒体的 3 倍。

表 2 中美媒体关于孙杨事件报道

中国媒体		美国媒体	
新华社英文版	16 篇	美联社	2 篇
<i>China Daily</i>	6 篇	CNN	3 篇
环球时报英文版	4 篇	ESPN	2 篇
CGTN 英文版	4 篇	Fox News	3 篇
人民网英文版	4 篇	纽约时报	2 篇

三、框架与修辞分析

（一）孙杨仲裁案报道中的框架

1. 知识框架

中美报道均以较大篇幅说明孙杨、FINA、WADA、CAS、瑞士联邦法院等主体的主张、行动和彼此的关系，让读者理解仲裁案的经过，这是该事件中的知识框架。

2. 道德框架

美国媒体借西方运动员之口，称孙杨为“drug cheat”，意在说明他违背了纯洁体育的精神并损害了其他运动员的权益。中国媒体通过指责仲裁委员长弗兰科·弗拉蒂尼（Franco Frattini）发表歧视中国言论、裁决不公正和对中国的偏见来驳斥孙杨和中国存在兴奋剂污点。这表明中美双方都使用了道德框架。

3. 性格框架

《环球时报》评论文章认为孙杨“强势的（forceful）”的性格导致他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这也构成了兴奋剂事件报道中的个体性格框架。该框架并非传统兴奋剂报道框架，笔者认为《环球时报》构建了一个新的框架。

4. 民族主义框架

美国媒体笔下西方运动员代表了公平竞赛的支持者和维护者，从而展现了西方体育的道德优势，而中国媒体主要以裁决的程序和事实作为反击美方的论据，未使用或回应民族主义框架。

5. 历史框架

美国媒体多次提及历史上中国运动员违反兴奋剂规定的事件，这种历史框架意在使读者接受中国运动员服用兴奋剂不仅仅是个人行为，更是源自国家操纵的结构性违规。中国媒体未提及中国历史上的兴奋剂事件和反兴奋剂努力，因此，中国媒体未使用历史框架。

综上，美国媒体使用了知识、道德、民族主义和历史框架，以试图证明孙杨违反兴奋剂检测程序、有重大的兴奋剂嫌疑以及中国具有兴奋剂污点，为辩论的正方。中国媒体使用了知识、道德、个体性格框架，以驳斥美方观点，是辩论的反方。

（二）各框架中的修辞辩论

表 3 呈现了中美报道在各框架中的辩论过程，反映了美国媒体和中国媒体如何进行一方发难、一方

反驳的辩论。

表 3 中美报道在各框架中的辩论

报道框架	争议点构成	中国媒体	美国媒体
知识框架	紧急状态	8 年禁赛裁决不合法；裁决被驳回合法	8 年禁赛裁决合法；裁决被驳回不合法
	事实	检测不合法；仲裁委员长发表歧视中国言论	孙杨不应打破血样瓶；孙杨团队操控法律
	道理	疑罪从无、程序瑕疵影响法律效力	运动员必须服从兴奋剂检测规定；操控法律，干扰审判
	人格权威	FINA、CAS	WADA 总干事
	定义	禁赛不合法，应被驳回	禁赛合法，不应被驳回
	价值	仲裁结果的无效与西方主导机构的偏见	孙杨和中国违反规则
道德框架	紧急状态	西方人士对中国存在歧视与偏见	孙杨和中国违反反兴奋剂条例，践踏体育精神
	事实	仲裁委员长发布种族歧视言论	国外运动员质疑孙杨
	道理	西方人士的道德水平值得质疑	破坏体育精神者应受到惩处
	人格权威	西方记者	勒克洛斯等
	情感	引导读者设想孙杨的处境	谴责孙杨拒检和可能的兴奋剂行为
	定义	仲裁“双标”	孙杨个人道德缺失
性格框架	紧急状态	孙杨的处境本可避免	
	事实	孙杨曝光检测人员身份证号	
	道理	拒检是由于孙杨的偏激性格，而非道德因素或国家系统性操控	
	定义	禁赛裁决事件是由孙杨性格导致的遗憾	
	价值	孙杨和中国并未破坏规则	
民族主义 框架	紧急状态		西方价值主导的观念被中国破坏
	事实		孙杨曾被查出使用违禁药品，但中国只对他处以 3 个月禁赛
	品质		西方公众对庞大的国家权力存有敌意
	道理		二元叙事策略
	人格权威		霍顿、WADA 总干事
	定义		孙杨和中国为西方崇尚的规则意识的破坏者
	价值		孙杨与中国破坏规则

续表

报道框架	争议点构成	中国媒体	美国媒体
历史框架	紧急状态		中国体育曾违反反兴奋剂规定，危害国际体育生态的紧急状态
	事实		孙杨曾在 2014 年被查出使用违禁药品；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兴奋剂丑闻
	道理		“塔西佗陷阱”
	定义		孙杨在中国的庇护下服用了兴奋剂
	价值		中国在历史上存在违反规则的污点

1. 知识框架中的修辞辩论

中美媒体聚焦于禁赛以及驳回裁决是否合法，这种亟待确认的状况构成了紧急状态，因此知识框架中的修辞情境为仲裁案的事实交锋。

(1) 美国媒体：孙杨和中国违反规则

为驳斥检测程序不合法这一事实依据，美国媒体均援引裁决书中指出：“孙杨并没有紧迫的理由表明他必须打破血样瓶。”针对中国媒体提出的 CAS 受理时间短、动机可疑，美国媒体援引 WADA 总干事所说的“FINA 原始听证会被仔细研读过”。针对中方使用的重要人格权威资源——FINA，ESPN 认为“FINA 认定孙杨未违规是为保护关键市场中的巨星”，由此消解 FINA 的权威。可以看出，美国媒体对中方调用的事实和人格权威一一辩驳，并利用运动员必须服从兴奋剂检测规定为道理，构建出“孙杨无权拒检，FINA 袒护孙杨，WADA 提起上诉，CAS 的裁决是公正的”逻辑链条作为修辞道理。据此，美国媒体将此次事件定义为孙杨不遵守反兴奋剂规定。

由于“政治正确”已成为西方诸多国家规约言行的“斑马线”，而反对种族主义是政治正确的核心之一，^[18] 裁决被驳回的原因无法作为可辩论的事实，美国媒体通过质疑孙杨法律团队的各种诉求，以非法化禁赛裁决的驳回。例如，孙杨法律团队以利益冲突为由，反对 WADA 最初指派的仲裁员，并要求将主检察长移出本案。美国媒体将此定义为“玩弄法律（legal twist）”，以此表明孙杨并非清白，而是试图通过玩弄法律脱罪。美方选取了对本方有利的法律知识组成辩论的事实依据，将裁决被驳回定义为由孙杨团队的钻营。因此，美方在知识框架中意欲构建的价值为孙杨和中国违反规则，且善于钻营。

(2) 中国媒体：仲裁结果不合理

中国媒体认定禁赛裁决不合法的事实为国际兴奋剂检测与管理机构（IDTM）检测程序不合法和 CAS 不公正裁决，如“三位检测人员中的一位承认他不是兴奋剂控制助手，而是一名建筑工人”；CAS 在其官网上承认“受理 WADA 上诉的依据并不充分，包括缺乏管辖、违背基本程序、准备仓促等”。对此，中国媒体强调“FINA 在此前的听证会上已经宣布孙杨未违反反兴奋剂条例”。辩论过程中使用的修辞资源包括作为道理的疑罪从无、程序瑕疵影响法律效力等法理原则；人格权威为 FINA 和 CAS。以上修辞资源将裁决结果定义为不合理且不合法的。

针对禁赛裁决被驳回，中国媒体引用了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发言：“Frattini 在关于动物保护问题上对中国使用了暴力语言”，因此“他可能妨碍公正的审判”。以上修辞资源中的道理也是程序不公正可能影响审判，人格权威为瑞士联邦法院。上述资源进一步将孙杨仲裁案定义为非法的，且针对他本人以及中国的阴谋，西方主导的机构对中国存在不公与偏见。上述争议价值层层递进，其证明了仲裁结果的无效与西方的偏见。

2. 道德框架中的修辞辩论

(1) 美国媒体: 中国践踏体育精神

美媒报道了多位国外运动员对禁赛的看法, 如南非游泳运动员查德·勒·克洛斯 (Chad le Clos) 表示: “体育治理机构应该重新考虑他 [孙杨] 对我们这项伟大运动以及其他许多干净游泳运动员的成绩、职业生涯所造成的损害。” 此处修辞道理为破坏体育精神应受到惩处, 并将此次事件定义为孙杨个人道德缺失。其价值表现为借西方运动员之口证实了孙杨践踏规则和体育精神。

(2) 中国媒体: 西方主导机构人员的歧视与偏见

中国媒体的道德框架集中体现在新华社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资深体育记者、悉尼奥运会媒体信息主管特蕾西·赫尔姆斯 (Tracey Holmes) 的采访中。文章标题引用赫尔姆斯所说的“如果孙杨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那将是巨大的耻辱”, 该标题暗示了仲裁事件导致了一件不公且亟待纠正的紧急状态。

赫尔姆斯首先说明自己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是不想看到任何人遭到不公正的待遇。赫尔姆斯是有效的人格权威, 一方面她是来自西方的相关人士, 另一方面她自述秉持公正的立场。针对裁决被驳回, 赫尔姆斯指出仲裁委员的种族主义言论与每个运动员应受到公正审理的理念相违背。在情感资源方面, 赫尔姆斯采取了共情策略, 引导西方读者, 设身处地地想象孙杨的处境。赫尔姆斯的质疑是对西方主导机构及其人员缺乏公正性的道德批判, 也构建了西方主导的道德值得质疑的修辞道理。上述修辞因素的应用使得赫尔姆斯有力地将仲裁事件定义为: “仲裁中存在双标, 这是由地缘政治造成的。” 该框架的价值为证实西方人士对中国的偏见与歧视。

3. 个体性格框架中的修辞辩论: 中国媒体激发同情

个体性格框架并非兴奋剂事件的传统框架, 而是中国媒体开辟的新的报道框架。《环球时报》指出“孙杨应接受检测后再向 FINA 提出抗议; 如果检测呈阴性 (had he tested negative), 他的职业生涯就不会受到影响。” 而他没有这么做是因为“强势的性格 (forceful personality)”。为了证明这一点, 该文还报道了孙杨在微博上曝光了三位检测人员中一位的身份证号一事。笔者认为, 之所以选择曝光该负面消息, 是因为相对于兴奋剂, 该事件负面影响程度更低, 但能为个体性格归因提供有力的支撑, 是一种避重就轻的策略。《环球时报》认为孙杨现在的处境本可避免, 由此设置了一种令人感到遗憾的情境, 引导受众同情孙杨的遭遇。因此, 个体性格框架采用了情感策略, 激发了受众的同情心理。

4. 民族主义框架中的修辞辩论: 美国将中国塑造为公平价值的破坏者

美国媒体主导了民族主义框架。其中的紧急状态为西方价值主导的观念被中国破坏。美国媒体提到, 西方运动员称孙杨为“使用药物的作弊者”, 而西方运动员是体育精神的代表, 西方运动员是该框架中的人格权威资源, 而孙杨在 2014 年被查出使用违禁药品时, 中国方面只对他处以 3 个月禁赛。美国媒体强调, 中国游泳协会对禁赛感到“遗憾”, 而采访孙杨的新华社是“由国家控制 (state-run) 的”, 这些事实暗示孙杨使用兴奋剂是个人和国家的共谋, 并利用了西方受众对于权力较为警惕的这一修辞品质, 强化了孙杨乃至中国的负面形象。美国媒体由此将中国塑造为一个对内袒护、管控严格, 对外强势的庞大权力体, 并将孙杨和中国定义为西方崇尚的规则意识的破坏者, 其价值为孙杨与中国对西方珍视并遵守的规制的破坏。

5. 历史框架中的修辞辩论: 美国强化中国规则破坏者形象

美国媒体通过将此次孙杨的兴奋剂仲裁与中国历史上的兴奋剂事件勾连起来, 构建出中国体育严重违背反兴奋剂规定、极大危害国际体育生态的紧急状态。根据美国媒体, 中国曾经触犯过反兴奋剂规定并试图掩盖, 孙杨乃至中国此次也不具公信力。而一旦丧失公信力将跌入“塔西佗陷阱”的无限泥沼而难以自拔, 即无论主体说的话是真是假、做的事情是好是坏, 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都会遭到社会公众的质疑和批评,^[20] 以说服受众有必要惩处中国的兴奋剂行为。因此, 历史框架中的道理为公信力塌陷, 这种普遍的心理认知模式将引导受众接受美国媒体的定义, 强化了中国规则破坏者形象。

四、研究结论

（一）中国媒体具备建构新框架的能力，美国媒体框架整合发挥了辩论效用

中国媒体创造的个体性格框架丰富了辩论角度、扎实了辩论依据，驳斥了美国媒体的道德框架和历史框架，也就是形成了跨框架的辩驳。这显示了中国媒体具备建构新框架的意识。但中方报道存在民族主义和历史框架的缺位，正如人民日报社办公厅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处副处长崔鹏指出的，我国当前国际传播存在的问题为习惯“报喜不报忧”，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比例失调问题。^[21]

出于对华抑制的传统，美国媒体将框架组成逐层递进的结构：知识框架是为证明孙杨违反了兴奋剂检测程序，道德框架是为谴责孙杨违背规则，历史框架是为通过呈现孙杨和中国体育在兴奋剂历史上污点，强化了中国规则破坏者的角色，民族主义框架则进一步凸显了西方在合规守约上的优越性。由此可见，美国媒体将不同框架整合为有意义的关系网络，而非零散的“节点”。

由此，本研究发现争议性事件报道中会包含多个框架，且多个框架整合而成的结构会形成强化作用，以进一步发挥框架的争议宣认作用。而设置得当的新框架不但可以创制新意义，还可以实现跨框架的辩驳。

（二）争议性事件报道中的修辞路径：定义为核心，以公共价值为旨归

中方报道在修辞路径层面表现出事实充分、逻辑恰当、道理明晰的特征，但对美方攻击观点缺乏“主动防御”，特别是未将西方受众的品质考虑在内。中方使用的人格权威多为组织，缺乏个体声音，未能有效调动情感。这也印证了我国传统的修辞实践对事实宣认有着近乎排他性的专注，^{[12](95)} 以及对其他者文化缺乏认识。反观美方，美国媒体使用了各种让西方受众对中国产生负面认知的细节与意向以及极具情感性的个体人格权威。作为正方的美国媒体，以此证明孙杨和中国在兴奋剂问题上的负面形象是真实可信的。

前人的修辞维度架构缺乏对其中争议点及其构成的权重情况、时序分布及组合方式的全面归纳。本研究发现，中美报道的组合方式为：首先，通过营造紧急状态构筑出修辞情境；然后，情境和作为受众特征的品质决定了如何选择和调配事实材料，以进行争议宣认；再次，报道辅以道理、情感、人格权威等修辞资源定义事件；最后，上述环节使得各框架产生特定价值。其中，定义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并最终导出价值，故定义是修辞的核心环节；同时，各框架呈现的价值叠加和总括形成共同价值，并设置了受众对事件的总体认知，因此实现共同价值是修辞的旨归。笔者认为，上述组合形式构成了修辞路径。由于这一路径在各框架中反复出现，在报道文本中按照相同的发展顺序，且辩论的正反双方都遵循同样的路径进行辩驳或打击对手，故这是争议性报道中的一般修辞路径（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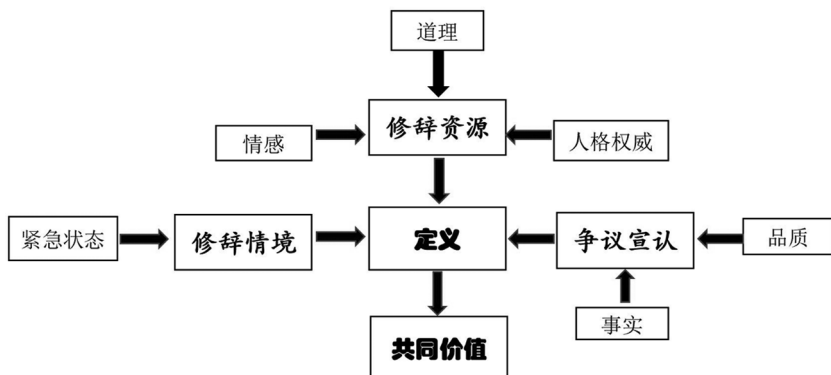


图1 修辞路径

(三) 忽视差异与共同责任, 中美媒体对话性不足

中美双方出于本国利益、媒体本身的性质和传统, 会利用修辞构建关于争议性事件的不同认知。但中国媒体由于未考虑到国外受众的认知特征而可能陷入舆论被动, 美国媒体对华抑制意图明显, 未表现出对话姿态。同时, 中国媒体还缺乏对国外受众不熟悉的现象与行为必要的解释, 这使得美国媒体借以攻击中国。在孙杨仲裁的报道中, 中方没有正视其历史上的兴奋剂问题, 而美方则忽略了中国近年来在反兴奋剂事业中的努力与贡献。中美媒体有意或无意忽视双方的差异可能误导受众, 引发国际舆论对立, 减损媒体的公信力。

由上可见, 中美媒体并未在此次事件中协商异见、追求共识, 故双方对话性不足。

五、启示与建议

(一) 注重框架的调用、创新和组织

从中美双方争议事件来看, 涵盖了经济、贸易、领土、历史、体育等领域。不同争议性事件等框架既有共性, 也有个性。因此, 在争议性事件中, 首先, 中方需对西方媒体在不同领域中的框架进行研究, 做出预案, 积极应对。其次, 中国媒体还应创制新的框架、范畴或议题, 以破除由西方牢牢掌握的话语樊笼, 形成跨框架辩驳, 主动出击。同时, 还有必要将报道中的不同框架整合为有意义的关系网络, 而非任其作为零散的“节点”, 这样才能做到辩驳和反击有的放矢。

(二) 谨慎定义、追求公共之善

话语权的重要标志就是定义权, 强调对争议进行命名和界定。^{[11](8)} 定义并非是事物的内在属性决定的, 而是在新闻生产实践中完成的。定义一旦形成将极大地影响公众对事件的认知、态度以及争议性事件应对的策略和手段。在争议性事件中, 中国媒体应首先确定不同框架的定义及各框架总括而成的共同价值, 再围绕定义和共同价值调配其他争议点。其次, 还应将受众的品质特征考虑在内, 补充必要的背景知识, 使用受众易于接受的道理, 构筑紧急状态, 以增加说服力、塑造可信感; 引入多元的人格权威, 并充分发挥情感所持有的说服效果, 也就是有学者倡导的“以感性话语传递理性诉求”^{[2](5)}。作为共识的公共之善可以促使双方搁置争议。世界反兴奋剂架构中存在权力冲突、规则适用的问题。因此, 兴奋剂事件报道中的共同价值应为反对兴奋剂、纯净体育、维护运动员权益, 而非单纯的遵守反兴奋剂机构规定。但在此次事件中, 双方报道中均缺乏反兴奋剂教育以及打击兴奋剂的国际合作图景。

(三) 正视差异, 以对话实现争议性事件报道的“求同存异”

在“存异”层面, 中国媒体应在理解国外受众心态、特征的基础之上, 在紧急状态、定义、品质、道理等更易于承载价值的争议点构成中诉诸认知或调整现有认知, 主动为国际舆论市场提供关于中国现实的历史解释和文化成因, 向国外受众传递关于争议性事件的中国意见和中国方案。在“求同”层面, 媒体应明确争议性事件中可以维护个体权益并推动社会、国家进步的公众之善, 如兴奋剂事件中的反兴奋剂立场、贸易摩擦中的互利共赢原则等, 并在通过对话积极推动公共之善。即使在争议性事件报道中, 媒体仍应充分履行其职责, 确保受众享有理解更为广泛的社会现实的权力。笔者认为, 只有这样才能在为中国争取更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的同时, 重塑国际媒体责任, 促进个体、社会与国家的公平。

参考文献:

[1] 吴世文. 争议性事件中的公众书写与新闻专业主义实践——以“邓玉娇事件”为例的考察 [J]. 当代传播, 2013 (3): 37

- [2] 万晓红, 周榕. 社会化媒体语境下体育赛事争议的对话性传播路径探讨——以平昌冬奥会女子 3000 米短道速滑判罚事件为例 [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9 (2): 1-6+133.
- [3] 余友辉. 论柏拉图理想政治与修辞学之关系 [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2): 124-129.
- [4] 聂静虹, 李磊磊. 承前启后: 新闻评论之架构效果探究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3 (3): 64-75+127.
- [5] 徐桂权, 方若琳, 苏幼真, 等. 主体建构与利益博弈: 现实建构主义视角下亚投行报道的框架分析 [J]. 国际新闻界, 2016 (6): 44-61.
- [6] 马得勇, 陆屹洲. 复杂舆论议题中的媒体框架效应——以中美贸易争端为案例的实验研究 [J]. 国际新闻界, 2020 (5): 99-120.
- [7] Pfister, G. & Gems, G. (2015). Fairy tales? Marion Jones, C. J. Hunter and the framing of doping in American newspapers. *Sport in Society: Cultures, Commerce, Media, Politics*, 18 (2): 136-154.
- [8] Wagner, U. & Kristiansen, E. (2019). The fall of the queen of nordic skiing: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wedish and Norwegian media coverage of the Therese Johaug scandal. *Nordicom Review*, 40 (1): 121-138.
- [9] 李红涛, 韩婕. 新冠中的非典往事: 历史类比、记忆加冕与瘟疫想象 [J]. 新闻记者, 2020 (10): 15-31.
- [10] Zhang, L. (2015). A cluster analysis of gender discrimination in Chinese and western news me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lish Linguistics*, 5 (3): 11-18.
- [11] 刘涛. 元框架: 话语实践中的修辞发明与争议宣认 [J]. 新闻大学, 2017 (2): 1-15.
- [12] 叶俊, 王苑奇. 修辞较量: 冲突情境下的反修辞策略——基于中美关于贸易摩擦新闻报道的比较研究 [J]. 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2): 90-96.
- [13] Ziek, P. (2015). Crisis vs. controversy. *Journal of Contingencies and Crisis Management*, 23 (1): 36-41.
- [14] 徐开彬. 争议性媒体事件中对话的可能或不可能: 从对话理论探讨汪辉与朱学勤事件 [J]. 新闻大学, 2013 (5): 72-83.
- [15] 张昆. 正视文化差异, 增强对外传播的有效性 [J]. 新闻记者, 2013 (9): 48-50.
- [16] 李欣人, 何明敏. 交往理论视阈下中国对外传播理念重构 [J]. 当代传播, 2017 (4): 23-24+33.
- [17] 胡百精. 危机传播管理对话范式 (上) ——模型建构 [J]. 当代传播, 2018 (1): 26-31.
- [18] 严庆, 崔舒怡. 从概念到规则: “政治正确”及其对民族议题的影响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2): 15-20.
- [19] 申林. 《利维坦》中国家主权与个人自我保存权之间的张力 [J].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3): 63-69.
- [20] 韩宏伟. 超越“塔西佗陷阱”: 政府公信力的困境与救赎 [J]. 湖北社会科学, 2015 (7): 29-34.
- [21] 崔鹏, 王峰. 当前我国国际传播面临的问题与思考 [J]. 对外传播, 2020 (9): 14-15.

[责任编辑: 高辛凡]